

北魏洛阳石窟分布规律试探

□ 杨超杰 连颖俊

北魏晚期,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自平城迁都洛阳前后,洛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开窟造像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龙门石窟的开凿,同时在洛阳城的周围,还有很多中小石窟的开凿,共计10个,它们就像众星捧月一般,分布在北魏洛阳城的周围,本文即是对这些石窟的分布规律进行的初步探索。

一、洛阳北魏石窟分布的大致情况

北魏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区东15公里,中国官办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东,它是在东周成周城的基础上,历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数代经营,到北魏时达到顶峰,外郭城的长、宽均已达到10公里,是近代以前全球所见范围最大的城市,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基于叙述石窟分布位置的方便,兹以北魏洛阳城为参照坐标简略叙述如下(图一):

(一) 城东1个

巩县石窟,位于今巩义市(巩县)河洛镇伊洛河北岸的大力山南麓,西距北魏洛阳城约44公里。现存洞窟编号5个,另有造像龕200余个,造像共计7000余尊。

(二) 城北3个

1. 吉利万佛山石窟

位于今洛阳市吉利区(原孟县吉利乡)与济源市交界处的柴河村,东南距北魏洛阳城约40公里。洞窟分上寺和下寺两个区,上寺区洞窟3个,摩崖立像1尊;下寺区洞窟2个,其中中心柱窟大部毁。

2. 孟津谢庄石窟

原位于今孟津县煤窑乡谢家庄东南约200米索罗沟的石壁上,前面隔小路而临一溪流,东南距北魏洛阳城约25公里。仅存一龕。因属于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后搬迁置放于县文管会库房内。

3. 新安西沃石窟

原位于今新安县西沃乡长泉公路黄河钢悬索

桥桥西,黄河南岸青要山的峭壁上,其下即是黄河,东南距北魏洛阳城约90公里。存洞窟2个,摩崖造像1尊,摩崖雕刻若干。因属于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后搬迁置放于千唐志斋博物馆内,称为北魏石窟,供人们观赏。

(三) 城西2个

1. 义马鸿庆寺石窟

位于今义马市东南8公里的石佛村之白鹿山,南临南涧河,陇海铁路从窟前通过,东距北魏洛阳城约60公里。现存洞窟5个,摩崖小龕1个。

3. 宜阳虎头寺石窟

位于今宜阳县城东约13公里苗村南200米的虎头山上,东北距北魏洛阳城约40公里。现存洞窟2个,摩崖千佛壁1个及碑刻若干。

(四) 城南5个

1. 伊川鸦岭石窟

位于今伊川县鸦岭乡西北甘水河东岸石佛寺村北的山崖上,甘水河北流注入洛河,东北距北魏洛阳城约45公里。现存洞窟2个。

2. 伊川吕寨石窟

位于今伊川县酒后乡吕寨村东北的半山腰上,远眺伊河,东北距北魏洛阳城约50公里。现存洞窟3个。

3. 嵩县铺沟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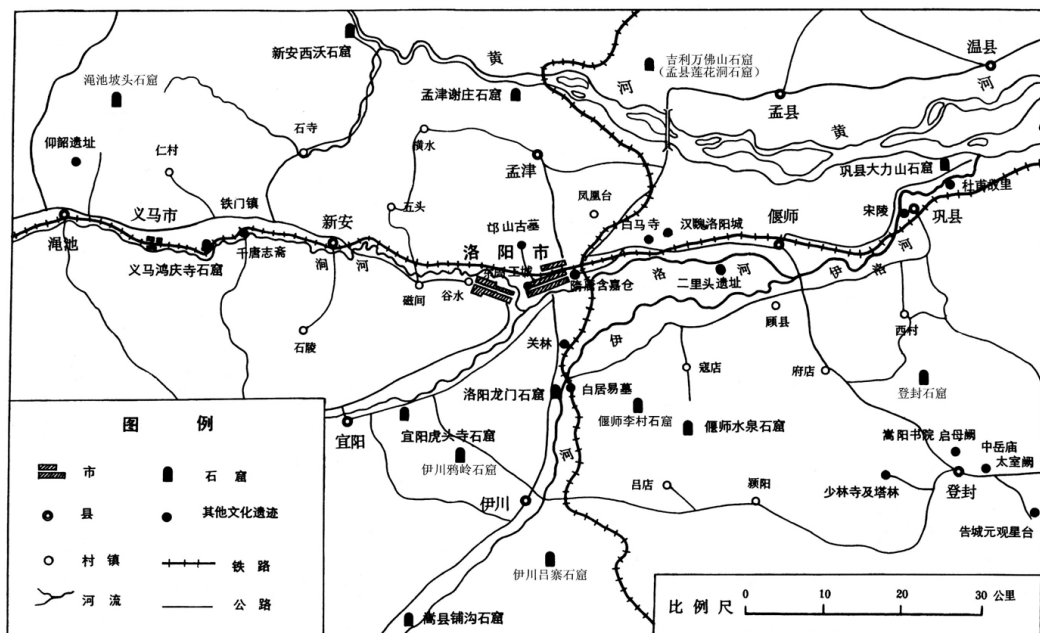
位于今嵩县北铺沟村南洛栾公路旁的断崖上,前临伊河,东北距北魏洛阳城约60公里。现存洞窟6个,临路面2个已作封堵保护。

4. 洛阳龙门石窟

位于今洛阳市洛龙区南端,东北距北魏洛阳城约25公里。编号洞窟2345个,造像近11万尊。

5. 偃师水泉石窟

位于今偃师市寇店镇水泉村石窟(门儿)东侧万安山的断崖上,面对沙河,北距北魏洛阳城约20公里。现存洞窟1个,系利用天然溶洞扩凿而成。



洛阳地区北朝石窟及文化遗迹分布图

二、石窟分布与 洛阳城市地理、人文环境的关系

1. 地理环境

北魏洛阳城位于洛阳盆地中心,周围群山环抱,北有邙山,西为秦岭之熊耳山,南有外方山,东有嵩山余脉,都城周围丰富的岩石地貌为石窟的开凿提供了适宜雕凿石窟的岩体。龙门石窟、铺沟石窟、西沃石窟、水泉石窟、虎头寺石窟、吕寨石窟等的岩石属石灰岩质,巩县石窟、鸦岭石窟、万佛山石窟、鸿庆寺石窟、谢庄石窟等的岩石为砂岩质,在不同的岩石质地上,人们为了达到心灵的慰藉,由此开凿石窟,产生了灿烂的石窟艺术。

2. 人文环境

对佛教极力宣扬的北魏王朝,远在他们过着游牧生活的时候,就已经与洞窟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青山鲜卑石室的被发现告诉我们,在他们屡屡南进的过程中,也不忘在太平登国年间派出特使到他们的发祥之地去缅怀祭拜他们心目中的圣地。这种浓郁的石室情结必将对他们的社会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1]另外,在北魏逐步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佛教文化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北魏初期的佛教发展史,就是建立在被征服地区佛教发展基础之上的,经过扩张占领,北魏王朝先后据有了蕴涵深厚佛教文化的河北、山东地区(后赵、后燕),关中地区(前秦、后秦),凉州地区(北凉)以及中原地区(汉晋佛教)等,

通过兼容并蓄最终形成北魏佛教多元化及趋向融合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云冈石窟的营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都城南迁洛阳后,其祖传下来的石室情结和开凿石窟的习惯加上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汉晋佛教文化传统,使洛阳出现石窟的开凿活动成为必然。

三、石窟分布与军事的关系

洛阳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多达 13 个王朝在此建都,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在军事上进可向东、向南、向北统治全国,退可稳守乃至撤向关中地区以自保是重要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在洛阳稳固安定发展的王朝,其社会必是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反之,一旦洛阳发生骚乱,全国必是分裂割据,战火频仍的混乱局面,由此可以看出洛阳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东有虎牢、成皋之险,西接函谷、崤函要隘,北临邙山、黄河屏障,南藉绵延之群山,处于拱卫洛阳城的需要,历史上多在洛阳周围设置关隘。最重要的一次是东汉中期(184 年),为了防止黄巾军的侵入,置八关都尉,设函谷、伊阙、广城、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 8 关守卫洛阳^[2]。自此以后,这些地方成为进出洛阳的险要重地。北魏时期,在这些关隘附近多有石窟的开凿,龙门石窟位于伊阙关,水泉石窟位于大谷关内,万佛山石窟位于孟津关附近,巩县石窟距小平津 30 公里左右等。其中龙门石窟中的 3 则造像记直接表明,守卫伊阙关的

功曹直接参与了石窟的造像活动^[3]。

四、石窟分布与交通的关系

洛阳位于天下之中,自古即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形势甲天下”之说,陆地交通发达。自洛阳向西,穿崤山,经灵宝,越华山北麓而直达八百里秦川,向东可通往江淮流域和山东地区,向南则之直达荆楚的广大地区,向北渡黄河,穿太行山可行进在三晋之地。如此交通便利之地,引来众多官民客商频频穿梭来往,佛教僧人为了弘扬佛教,往往在交通要道旁适时开凿石窟。自洛阳向西,在两京古道旁刻有义马鸿庆寺石窟、宜阳虎头寺石窟等,城北沿黄河南岸,自西向东依次有新安西沃石窟、孟津谢庄石窟、巩县石窟等,城南通往荆楚之地,则有伊川鸦岭石窟、伊川吕寨石窟、嵩县铺沟石窟等。同时,位于关隘附近的龙门石窟、水泉石窟、万佛山石窟等实际上也与水陆交通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石窟分布与洛阳城的关系

石窟即是开凿在山崖上的寺院,如此至多的石窟开凿在洛阳城的周围,与当时北魏的佛教政策有着紧密的关系。迁都之初,即规定在城内建佛寺只能有二所,包括大量的皇亲国戚,也多在城外建寺院。因为北魏王朝是一个极具佛教色彩的国家,在洛阳,对佛教的崇信和支持的一些活动就只能在城外,当然开凿石窟与建立寺院相比较而言是费力又费时的。因此,在城周大量开凿石窟只是佛教活动的一个方面而已。北魏末期,朝纲混乱,规制无度,在城内寺院建设达到滥觞。《洛阳伽蓝记》载,城内有佛寺1300多所,大型石窟的开凿即不复存在,换言之,洛阳城内佛寺的大量涌现,是造成石窟造像从体量到数量都大量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石窟分布与佛教发展的关系

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如何与传统文化融合并发展,这是一个佛教徒与当地居民都非常敏感的问题,从两则成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即可窥见一斑,“胡说八道”即是人们对西域乃至印度僧人在宣扬佛教“八正道”的客观认识,而“胡言乱语”则是人们对佛教传法活动的鄙视。因此,早期佛教的发展有两个客观的问题必须解决。其一,生存问题,分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本身的生存,佛教传入中原地区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并

取得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和广大平民的信奉,在统治者方面,高僧沙门统法果的“跪拜皇帝即是礼佛”的思想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统治者与佛教发展的冲突,有了统治阶级的认可,佛教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得以消除。“上既崇之,下弭企尚”,民众的信仰自然趋之若鹜,广建寺院与开凿石窟成为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劳而获”的传播佛教的僧人的生存问题,他们主要是依靠信徒的布施和供奉来生存的,生存是第一位,传播佛教是目的,这些都是通过寺院和石窟来实现的。寺院和石窟设置在人口稠密区、交通发达区和流动人口密集去是由它的生存问题所决定的,待佛教发展至唐代,所谓中国化的佛教完全形成,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信仰佛教由被动的认知已转向发自内心的向往,生存问题已不复存在。其二,佛教的发扬光大,石窟的散布各地特别是位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区和交通发达的区域,正是最大限度的吸引民众来朝拜和供奉,并由此得到传播佛教的空间的一种形式。

七、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洛阳周边石窟的大量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其一是传统的开凿石窟的惯性使然,其二是城内有关建设寺院的限制,随着限制措施的崩废,石窟的开凿即趋向衰落。

2. 石窟均开凿在洛阳周围的重要关隘和交通要道之所在,这里往往是人员居住和通行的密集地区,石窟开凿在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僧人就食生存的需要,一方面是传播佛教文化的需要。

3. 关隘附近石窟的开凿可能与守关官吏和军士有很大的关系,官兵可能就是礼拜和供奉佛教的主体,在龙门石窟古阳洞内,就有3例造像龕系伊阙关的官吏所施造。

4. 对探讨龙门石窟始凿时间的借鉴作用,文化的传播交流往往是跨越政治界限的,北魏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开凿石窟寺习惯的活动,可能在占领统治洛阳之际即已开始,它与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特定的政治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龙门石窟的开凿可能早于迁都,而在北魏开始占领洛阳之后不久。

5. 佛教在南北朝及以前与唐代以后的活动有着

(下转28页)

1997年,303页。

[13]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4年第2期130页。

[14] 苏兆庆、张安礼《山东莒县沈刘庄汉画像石墓》,《考古》1988年第9期791页。

[15] 同注[8]。

[16] 同注[3]。

[17] 同注[3]。

[1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111页。

[19]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山东平阴孟庄东汉画像石墓》,《文物》2002年第2期40页。

[20] 王思礼《山东章丘普集镇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38页。

[21] 平原县图书馆《山东平原王韩村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131页。

[22]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山东济南青龙山汉画像石壁画墓》,《考古》1989年第11期991~992页。

[23] 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禹城汉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85页。

[24] 德州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宁津县庞家寺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

[25] 同注[18]。

[26]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

集 -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2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

[27] 同注[10]。

[28] 同注[26]。

[29] 博兴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博兴县出土汉代骑马俑灯》,《考古》1987年第2期187页。

[30] 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秦汉青铜器概论》,文物出版社,2002年,198页。

[31] 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7期84页。

[32] 熊传新、雷从云《我国古代灯具概说》,《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74页。

[33] 同[32]。

[34] 既陶《山东省普查文物展览简介》,《文物》1959年第11期。

[35] 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清理简况》,《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0年,116~120页。

[36] 高丰、孙建君《中国灯具简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1年,39~40页。

[37] 雷云贵《西汉雁鱼灯》,《文物》1987年第6期69页。

(宋叶,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助教;刘晓婧,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

(上接39页)

本质的不同,在面向社会群体这个方面,早期佛教活动的任务是发展壮大佛教人口,佛教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面融合,发展到唐代,所谓中国佛教完全形成,早期佛教的任务大功告成,佛教在中国形成全新的发展时期,佛教在人们心中由被动的接受到全身心的探索中去,佛教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换言之,早期佛教重在宣传发展,后期佛教重在探索参与。

[1] 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2] 《后汉书·孝灵帝纪第八》,《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中华书局点校本。

[3] 刘景龙、李玉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天龙山文管所)